

“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陈卫平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摘要: 金岳霖写于1930年的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审查报告》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一“金岳霖问题”把内在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尖锐地提到学术界面前：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的学科，是指其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中固有的哲学的民族性呢？还是指其以西方的现代学科标准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拣择可称之为哲学的东西予以重建呢？“金岳霖问题”揭示的这一矛盾，有见于从胡适到冯友兰的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践，并在张岱年那里得到某种回应。本文通过分析胡适、冯友兰、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来论证这一点。

关键词: 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现代性；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金岳霖1930年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审查报告》中提出：“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P434-438)}这一“金岳霖问题”，涉及到至今仍在争论的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学科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20世纪初期，当中国哲学史以一门新的学科亮相时，其学科独立性问题就出现了。然而，是“金岳霖问题”将内在于其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矛盾尖锐地提到学术界面前，即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的学科，是指其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中固有的哲学的民族性呢？还是指其以西方的现代学科标准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拣择可称之为哲学的东西予以重建呢？“金岳霖问题”揭示的这一矛盾，有见于从胡适到冯友兰的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践，并在张岱年那里得到某种回应。这里通过分析胡适、冯友兰、张岱年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来论证这一点。

—

“中国哲学史”作为学科观念，始于1914年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然而，中国哲学史作为独立的学科登上中国现代学术舞台，则是由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奠基的。“五四”时期胡适对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在内的“国故整理”，是以“疑古”为标帜的，这是对“信古”即盲目崇信儒家经典的反动，旨在扫除对经学的偶像崇拜。由此出发，胡适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的奠基，主要是赋予其走出经学的现代性品格。

在传统中国，一切学术都依附于经学之下。因此，在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领域里，学科现代性的首要表征是摆脱对经学的依附关系，而安置于现代学科体系之中。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独立也不例外。这是以哲学与经学相分离为前提的。在胡适之前，在北京大学也是在中国讲授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的第一人是陈黻宸，但他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在实际上是试图把作为现代学科体系中的哲学纳入儒家经学的知识体系：“欧西言哲学者，考其范围，实近吾国所谓道术”，而儒学正是“尽力于道术，得其全者”，因此，“儒术者，乃哲学之极轨”。^{[2](P415)}以后，谢无量著有《中国哲学史》出版，把“唐虞”至清代的哲学，分为上古、中古、近世来叙述。这比之陈黻宸始于伏羲而终于姜太公的“中国哲学史”，尽管在体例上具备了中国哲学通史的规模，但仍然把哲学混杂、隶属于经学：“道术即哲学也”，“古之君子，尽

力于道术得其全者是名曰儒”，因此“儒即哲学也”，认为“六艺”经孔子删定，成为“儒家之秘要，哲学之统宗”。^{[3] (P2)}因此，他们所谓的中国哲学史还是笼罩在经学知识体系之下，实际上表现了信古的价值取向。胡适斥责“经学与哲学的疆界不明，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大毛病”，强调“经学与哲学究竟不同：经学家只要寻出古典经典的原来意义；哲学家却不应该限于这种历史的考据，应该独立地发挥自己的见解，建立自己的系统”，因此，“经学家来讲哲学，哲学便不能不费许多心思力气去讨论许多无用的问题，并且不容易脱离传统思想的束缚，哲学家来讲古经，也决不会破除主观的成见，所以往往容易把自己的见解读到古书里去”，于是，“经学与哲学合之则两伤，分之则两收其益”。^{[4] (P1071-1072)}胡适正是出于这样的哲学与经学相分离的自觉认识，首先迈出中国哲学史独立于经学的现代步伐。

他的诞生于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标志了这一点。首先，为了分明哲学与经学的疆界，它在开篇之首就给哲学和哲学史下了定义，确立了哲学史的学科边界。其次，它撇开儒家经传的古史观来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起源，悬置三皇五帝，一部哲学史从老子、孔子讲起；它废除了经学的定儒学于一尊，对先秦诸子给予同样的地位；这些以清末康有为、章太炎等的经学、子学研究为基础，但又褪去了他们今古文之争的经学色彩。再次，它在写作的形式上也与经学的注释形式针锋相对，即把以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改为以自己的话作为正文。另外，它在诸子起源、孟子井田制、诸子之书真伪等问题上，都对传统经学提出质疑。以后胡适说：《中国哲学史大纲》“这一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5] (P105)}所谓“变色”就是改变此前类似陈黼宸、谢无量那样蒙在中国哲学史身上的经学之色，由此显示了这门学科的独立性。这样的变色表现了中国哲学史冲破经学藩篱而走进了现代学科体系。冯友兰多次肯定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这种现代性倾向：“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6] (P213)}

但是，中国哲学史从经学中独立出来的这种现代性倾向，其实质是由经学范型转向了西学范型。因为中国传统学术中并无哲学学科，哲学学科来自西方学科体系。因而中国哲学史在与经学分离的同时，又必然产生对西方哲学的依傍。事实上，《中国哲学史大纲》正是如此。胡适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本书的主张，但以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7] (P22)}蔡元培在该书“序”中也说：“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其中之一是“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因此“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这里的“不可不”、“不能不”，表明以西学为范型是中国哲学史学科脱离经学而独立的必经一步。然而，中国哲学是有其民族特点的。如果对此不注意，那么中国哲学史又会成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翻版。分别在1923年和1929年出版的《周秦哲学史》（陆懋德著）和《中国哲学史》（钟泰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有鉴于此，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了挑战。前者认为胡适以西方式的知识论（逻辑方法）眼光整理先秦哲学，完全是抹杀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吾国哲学略于方法组织，近人多以此为病，不知吾国哲学之精神，即在于此。盖哲学之微言大义，非从悟入手不可……遑论组织？遑论方法”，^{[8] (P4)}因而其取材结构仍依传统的六家之分；后者强调中西哲学是各自自成系统的。用西方哲学术语来叙述中国哲学，就会扭曲后者的真实面目，是极不合理的：“中西学术，各有系统，强为比附，转失本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9]于是沿用传统术语而摒弃西方哲学用语。总之，他们试图净化中国哲学史研究中西方哲学的一切印迹，以拒绝西方哲学范型来维护中国哲学史的独立性。

于是，我们看到了胡适和陆懋德、钟泰两种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不同态度。金岳霖的《审查报告》对这两种态度作了概括：“写中国哲学史就有根本态度的问题，这根本的态度至少有两个：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中国国学中之一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陆懋德、钟泰显然是持

前一种态度的，金岳霖对此不以为然。因为“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所以“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现在的中国人免不了时代与西学的影响，就是善于考古的人，把古人的思想重写出来，自以为是述而不作，其结果恐怕仍不免是一种翻译。同时即令古人的思想可以完全述而不作的述出来，所写出来的书不见得就是哲学史”；这实际上是批评陆懋德、钟泰是使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构走回到经学的“信古”老路，而背离了这一学科置身于现代学科体系的历史趋势。他赞同以“第二个根本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即以“普遍哲学”实即西方哲学的一般作为学科依据，来发现中国学术中与之相应的东西，并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归之于此类。可见，在胡适面临陆懋德、钟泰挑战时，金岳霖为其作了辩护，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依傍西方哲学是合乎学科现代性要求的。同时，他指出这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并非是根据西方某一种哲学观点来诠释中国哲学，否则就会遮蔽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性。然而，“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主张写出来的”；这种哲学主张即实用主义。因而“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就是说，以“在中国的哲学史”来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必须顾及其民族性。

其实，胡适对此是有所意识的。他认为“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东西两支”，它们是“独立发生”的，而中国哲学是东支的代表，并称中西哲学有“大同小异或小同大异的学说”。^{[10] (P4、22)}这些都触及到了中国哲学在民族性的向度上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独立性。不过，胡适以“疑古”治中国哲学史，重在学科的现代性，以至于把中国传统哲学过度地作了现代性的诠释，如金岳霖批评的：“对于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让他们保存古色，他总觉得不行，一定要把他们安排到近代学说里面，他才觉得舒服”。把学科的现代性与保存学科对象的传统原色相混淆，意味着胡适还不能自觉地探求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存在的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问题。随着陆懋德、钟泰的挑战，这一问题就凸现出来，成了在胡适之后研究中国哲学史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二

继胡适之后，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代表性人物的是冯友兰。不过，他治中国哲学史的态度不是“疑古”而是“释古”。在他看来，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正”、“反”、“合”。因此，“释古”既批评“信古”的抱残守缺，又否定“疑古”的激进反传统。冯友兰正以这种不迷信传统又理解传统的“释古”精神来探求中国哲学史的独立性。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把中国传统哲学分为子学和经学两个时代，后一时代终结于康有为。此后中国哲学进入了后经学时代，这是西学冲逼经学的结果：“西洋学说之初东来，中国人如康有为之徒，仍以之附会于经学，仍欲以旧瓶装此绝新之酒。然旧瓶范围之扩张，已达极点，新酒又至多至新，故终为所撑破”。^{[11] (P5-6)}就是说，后经学时代在学术范型上是以西学更替经学即“新瓶”更替“旧瓶”。因此，“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在他看来，中国的义理之学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内容约略相当。那么为何不能以中国义理之学史来取代中国哲学史作为学科之名呢？义理之学乃经学之一部，用其作为学科之名，仍然是以经学之“旧瓶”来装哲学之“新酒”，没有显示出后经学时代学术范型转变的现代性。对此冯友兰这样说道：“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为哲学，则无此困难”。^{[12] (P3、6)}就是说，在西方学科体系成为了现代中国学科规范的后经学时代，学科现代性的要求，决定了中国哲学史与经学相分离而独立，必须以西方哲学为蓝本。

如果说提出后经学时代来认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表现了冯友兰“释古”精神反对迷信传统，坚持走出经学学术体系的现代性，那么区分哲学的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以考察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则表现了冯友兰“释古”精神理解阐释传统，试图使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独立性兼具现代性与民族性。

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但如谓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无实质上的系统，则即等于谓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不成东西，中国无哲学”；“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之”，因此，“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13] (P10)}所谓“找出”云云，就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质系统进行阐释，而阐释则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逻辑重建的过程，这就需要以注重形式系统的西方哲学为榜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西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实是整理中国哲学之模范”。^{[14] (P402)}显然，他认为把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予以形式系统化，正表现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围由经学转向西学的现代性。

就实质系统而言，何谓中西哲学同有之，冯友兰语焉不详。但依据他在《中国哲学史·绪论》里的论述来看，是指中西哲学研究对象的对应性：“其研究天道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宇宙论。其研究性命之部分，即约略相当于西洋哲学中之人生论。惟西洋哲学方法论之部分，在中国思想史之子学时代，尚讨论及之；宋明而后，无研究之者。自另一方面言之，此后义理之学，亦有其方法论。即所讲‘为学之方’是也。不过此方法论所讲，非求知识之方法，乃修养之方法，非所以求真，乃所以求善之方法”。然而，实质系统在研究对象上的对应性，并不意味着中西哲学的同一性：“各哲学之系统，皆有其特别精神，特殊面目，一时代一民族亦各有其哲学”。^{[15] (P12)}他指出：与西方哲学相比，在宇宙论；“中国哲学迄未显著的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在人生论上，“中国哲学家多注重于人是什么，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在方法论上，中国哲学热衷的是修身养性的“为学之方”而较少谈及求知识的方法，“故知识问题（狭义的）未成为中国哲学上之大问题”，“亦少人有意识的将思想辩论之程序及方法之自身，提出研究”。因此，他认为建立以西方哲学为范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另一要义，不是把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强行纳入西方哲学的实质系统，由此将其阉割和肢解；如“为学之方”，用西方的哲学眼光来看，“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16] (P8)}就是说，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独立性还必须表现在维护中国哲学实质系统方面不同于西方哲学的民族性。于是，以西方哲学为范型而建立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在实质系统上就是“用另一种文明去阐明某种文明，使两种文明都能被人更好地理解”，就是“对于中国的与欧洲的哲学观念在作比较研究”，“把它们看作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人类本性同一原理的不同表现”，旨在“弄清一种观念用另一种观念讲是什么”。^{[17] (P270)}这样，中国哲学史学科由依附经学转为参照西方哲学的独立性，既有形式系统上的现代性，又有实质系统上的民族性。

由上述可见，从胡适到冯友兰，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独立性，是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金岳霖有见于此，肯定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注重的“不仅是实质而且是形式”，因而它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都是“在中国的哲学史”，但前者比后者高明，避免了后者按某种西方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而是“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即写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特色。也就是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出版后，很快取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而代之，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典范，并非仅仅是在于它具有了后者欠缺的通史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中国哲学史开始成为现代性和民族性兼具的独立学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二册出版的1934年，有一部蒋维乔、杨大膺合著的《中国哲学史纲要》（三册）问世，该书以“悉用西洋哲学名词，而废去中国原来各家的旧名”，^{[18] (P5)}按照西方哲学的自然主义、人为主义、享乐主义、苦行主义、神秘主义、理性主义来概括中国哲学。该书虽然也是通史，也是“在中国的哲学史”，但由于

只是一味套用西方哲学名词，基本忽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特点，因而尽管在形式上颇有新意，但没有在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史上留下什么影响。这也表明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在探求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问题上的意义，在于其自觉思考了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但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上述探求，仍然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指出中国哲学史作为现代学科，必须由经学范型转向西学范型的时候，实际上如金岳霖所说，“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来确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因此，尽管冯友兰注意到了中西哲学的对应性和同一性的区别，但还是免不了陷入这样的两难：如果将中国传统思想中与西方哲学问题不相一致的内容称之为“哲学”而纳入中国哲学史，似乎有点勉强；如果不纳入，则又无法显示中国哲学特有的贡献。金岳霖委婉地揭示了这样的两难。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绪论》以西方哲学的标准，把哲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方法论三部分，然后说：“吾人观上述哲学之内容，可见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魏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谓约略相当”。这里未将先秦诸子列入，显然是他认为先秦诸子研究对象与西方哲学的内容相去较远；然而，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册就是写的先秦诸子。有见于这个矛盾，金岳霖说：既然把“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那么“先秦诸子所讨论的问题，或者整个的是，或者整个的不是哲学问题，或者部分的是，或者部分的不是哲学问题，这是写中国哲学史的先决问题”。冯友兰上述的关于中国传统中的知识论和“为学之方”的论述，也反映了这样的两难。二是把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相割裂，认为“此两者并无连带关系”。^{[19] (P10)}这意味着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构来讲，形式系统只有现代性问题而没有民族性问题，实质系统只有民族性问题而没有现代性问题。金岳霖对这样的割裂实际上是有疑惑的。他以为从形式系统来说，也需要考虑体现中国传统“论理的方式”特点的问题，“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论理当作普遍的论理，如果先秦诸子有论理，这论理是普通的呢？还是特别的呢？这也是写中国哲学史的一先决问题”；就实质系统而言，他认为应当考虑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异同的程度问题”，这包含着揭示前者异于现代性的要求。由于有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如何使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独立性兼具现代性与民族性，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那里，还没有得到圆满的解决。金岳霖对这两方面问题的觉察，正表明了这一点。

其实，这两方面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无法避免的。因为这样构建的中国哲学史，以“欧洲的哲学问题当作普遍的哲学问题”，实际上是把中国哲学的民族性放到了从属的地位。因此，尽管金岳霖认为，从胡适到冯友兰，表明作为现代学科体系的“中国哲学史”只能是“在中国的哲学史”。然而，他对上述两方面问题的觉察，又促使人们思考：构建现代学科体系的“中国哲学的史”是否可能？

三

如果说胡适、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史是与“疑古”、“释古”相联系的，那么张岱年研究中国哲学史则是其“文化创造主义”的体现。“文化创造主义”的根本主张，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创造的综合”，即扬弃两者而创新，由此来“建设新的中国文化，既非旧文化，也非西洋文化的附庸”。^{[20] (P257)}“非旧文化”是指与旧封建文化相对立现代性，就此而言“我们不只主张不复古而已，我们亦主张‘反古’”；而“非西洋文化的附庸”则是指民族性，即学习西方文化“不当只是取过来而已，更当加以发展使带着中国的特色”。^{[21] (P277、260)}正是依据这样的主张，张岱年在冯友兰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了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独立性达到现代性和民族性相统一的问题。

从“非旧文化”来说，张岱年和胡适、冯友兰相类似，也认为中国哲学史独立于经学的学科现代性，是与以西方哲学为标准相联系的。他指出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之一是经学与哲学的结合，实际上是把哲学束缚于经学之中。他说他的《中国哲学大纲》“区别哲学与

非哲学，实在是以西洋哲学为表准，在现代知识情形下，这是不得而然的”。^{[22] (P17-18)}就是在西方知识体系已取得普世性的条件下，只有以西方哲学为表准，中国哲学史才能从经学中独立出来，取得现代性的品格。他对“中体西用”的批判，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其所谓西学当即指科学，而中学则指经学与理学。假如以我们经学、理学为‘体’，西洋科学是再也学不来的，又如何能作为‘用’呢？”^{[23] (P268)}这实际上指出了像谢无量、钟泰那类“中体西用”式的中国哲学史，是无法使中国哲学史成为现代性的独立学科。如果说张岱年上述的观点只是重申了胡适、冯友兰以往的认识，那么，他的《中国哲学大纲》以“中国哲学问题史”的面目出现，则表现了这样的意图：比冯友兰更好地解决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独立性既有现代性又有民族性的问题。该书“自序”说：“近年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颇盛，且已有卓然的成绩，但以问题为纲，叙述中国哲学的书，似乎还没有。此书撰作之最初动机，即在弥补这项缺憾”。^{[24] (P17)}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在1934年出齐，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写于1935年，完成于1937年。因此，这里的“研究颇盛”、“卓然的成绩”之语，显然是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主要对象的，其“弥补缺憾”当然也是以此为对象的。他所要弥补的缺憾之一，就是解决冯友兰在探求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中遗留的问题。他的《中国哲学大纲·自序》一方面肯定“冯芝生先生谓中国哲学虽无形式上的系统，而有实质上的系统，实为不刊之论”，另一方面紧接着指出“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25] (P18-19)}可以说是含蓄地表达了这一点。

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序论》表明，以“中国哲学问题史”来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其前提是把哲学看作某类学问的“总名”，而这类学问就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毫无疑问，中国和西方都有对这类学问的研讨。因此，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各是此类学问的某个“特例”。这似乎与他以西方哲学作为区分哲学与非哲学的标准有矛盾，其实不然。因为他对哲学的上述界说，不是以西方某“一家哲学之界说”来立论的，而是“总各家哲学观之”。就是说，他的哲学界说，是对西方各家哲学界说的一般抽象；他以此来区分哲学与非哲学当然还是以西方哲学作为标准的。这样一来，意味着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并不意味着“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这较之冯友兰把西方哲学当作普遍哲学来确认中国哲学的存在更为合理，于是，在冯友兰那里既要以西方的哲学为标准又要把中国思想中不合这一标准的东西纳入哲学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把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看作均为某类学问的特例，其涵义是两者的论域是相同的，而两者在同一论域中提出的问题以及思考问题的进路和对问题的回答则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把中国在这一论域中出现的不同于西方的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和对问题的回答归属中国哲学史，不仅没有任何尴尬，而且是十分必须的；否则就不足以显示其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例。因此，在张岱年看来，以“中国哲学问题史”来建构中国哲学史，最能实现这一学科的独立性既具有从束缚于经学转为立足于西方知识体系的现代性，又具有不是西方哲学附庸而彰显“中国哲学之特色”的民族性。

张岱年之所以用“中国哲学问题史”来建构中国哲学史，还在于他认为这样可以把冯友兰所割裂的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统一起来。因为以问题为纲来叙述中国哲学的源流发展，既涉及从原本浑融一体的思想中选出问题予以条理化的形式系统，又涉及在对问题的阐释中体现原有的实质系统。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统一于问题，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构来讲，意味着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都应当既有现代性又有和民族性。

张岱年认为把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予以形式系统化，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现代性所必须的。他说：“中国哲学既本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我们是不是应该以条理系统的形式来表述之呢？有许多人反对对中国哲学加上系统的形式，认为有伤于中国哲学之本来面目，或者以为至多应以天、道、理、气、性、命、仁、义，等题目顺次论述，而不必组为系统。其实在现在来讲中国哲学，最要紧的工作却正在表出其系统”。^{[26] (P1-5)}就是说，形式化系统的现代性是中国哲学史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首要条件，不能以维护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民族性为借

口而予以拒绝。这和冯友兰是一致的。但是，以问题史来表述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强调的是“寻出整个中国哲学的条理系统”，而不是寻出“每一个哲学家之系统”。^{[27] (P18)}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按照哲学家年代先后展开，主要是把所叙述的每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加以系统化。与之相比较，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形式系统化的建构方面做出了新的贡献。他在这方面做出的更重要的贡献，是注意到了冯友兰所忽视的形式系统的民族性问题，即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形式系统建构上，不能只是仿照西方哲学，也要体现“中国哲学之特色”。张岱年在写作《中国哲学大纲》之前，已对中国哲学的辩证法传统作了研究。传统辩证思维在表达形式上的显著特点，就是运用成双的对偶范畴。《中国哲学大纲》在形式系统的建构上吸取了这一特点，最为突出的是“人生问题论”中，全部的九个问题都是以对偶范畴的形式来表达的。因此，《中国哲学大纲》在形式系统方面的建构，比之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朝着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质系统的建构，张岱年强调考察其“在根本态度上很不同于西洋哲学或印度哲学”的基本倾向，从而显示其“中国哲学之特色”。^{[28] (P5)}在注重中国哲学实质系统的民族性上，张岱年继承了冯友兰的思想，尽管他们对于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所具有的民族特色有不完全相同的概括。张岱年在这个方面对冯友兰的缺憾的弥补，主要表现在他意识到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质系统建构，除了民族性向度之外，也有现代性向度。他指出：“中国旧哲学虽是过去时代的，其内容则并非完全过去。中国旧哲学中，有一些倾向，在现在看来，仍是可贵的，适当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中之活的。而也有一些倾向，是有害的，该排斥的，便可以认为是中国哲学中之死的。”^{[29] (P58)}激发中国哲学中“活”的，批判中国哲学中“死”的，就是建构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质系统的现代性问题，其本质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的实现。冯友兰曾把从“信古”到“疑古”再到“释古”，说成是正、反、合。其实，“释古”之“合”，只是就认识传统哲学的历史价值而言的，因为“释古”主要是阐释传统之历史意义；如果就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而言，那么到张岱年那里才是正、反、合之“合”，因为提升了传统中“活”的、排斥了传统中“死”的中国哲学史，仿佛是在回顾历史，其实是在创造传统的现代价值。可见，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实质系统建构上也有着民族性和现代性相统一的自觉。

张岱年对冯友兰缺憾的弥补，当然也是对金岳霖《审查报告》的回应。他在《中国哲学大纲·序论》中指出：“所谓中国哲学，可以指中国人的哲学，也可以指中国系的哲学。哲学可以分为数系，即西洋系，印度系，中国系，中国人的哲学，未必即是中国系的哲学”，就是说，“中国人的哲学”可以是在中国的西洋系、印度系的哲学，而“中国系的哲学”则是“由中国哲学传统中出来的”；在作了这样的区分后，强调“本书所谓中国哲学，乃是指‘中国系的一般哲学’”。很明显，“中国人的哲学”史和“中国系的哲学”史相当于金岳霖的“在中国的哲学史”与“中国哲学的史”。金岳霖认为后者在现代学科体系下是不可能的。张岱年突出《中国哲学大纲》所写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系的哲学”史，意在证明建构现代学科体系的“中国哲学的史”是可能的。这表现了在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上，对如何将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进一步的探索。

如果从思想演进的逻辑来看，张岱年的回应是引起对金岳霖思考的。^[30]后者在1940年代所写的论文《中国哲学》以及《知识论》中都不是从“在中国的哲学”而是从“中国哲学”的意义上论述中国哲学的。他区分了知识论和元学的不同，认为前者不可能有“中国哲学”意义上的现代理论体系，而后者作为民族“中坚思想”、“最基本的原动力”的智慧，可以构建“中国哲学”意义上的现代理论体系。因而他研究元学的《论道》以中国传统哲学概念为骨架，试图走出构建“中国哲学”意义上的现代理论体系之路。冯友兰评论道：“现代化与民族化融合为一，论道的体系确切是‘中国哲学’而《知识论》则是‘知识论在中国’”。^{[31] (P198)}金岳霖把“哲学在中国”和“中国哲学”分别对应于知识论和元学的理论建构，

也许并不妥当。但是，就构建中国哲学史兼具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独立学科来讲，则有启发意义，即如何超越知识论层面而从智慧层面来达到现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受此启发，他的学生冯契在 20 世纪末叶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32]

（谨以本文纪念金岳霖诞辰 110 周年和冯契诞辰 90 周年）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下)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434—438、5-6.
- [2] 陈黻宸集(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415.
- [3] 谢无量. 中国哲学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16. 2.
- [4] 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1071、1072.
- [5] 胡适文存三集(二) [M]. 安徽: 黄山书社, 1996. 105.
- [6] 三松堂全集(一) [M]. 河南: 人民出版社, 1985. 213.
- [7] 中国哲学史大纲 [M].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997. 22、4、22.
- [8] 陆懋德. 周秦哲学史 [M]. 北京: 京华印书局, 1923. 4.
- [9] 钟泰. 中国哲学史·凡例 [M]. 辽宁: 教育出版社, 1998.
- [10] 中国哲学史(上)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3、6、10、12、8、10.
- [11] 三松堂全集(十一) [M]. 河南: 人民出版社, 1985. 402、270.
- [12] 中国哲学史纲要(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34. 5.
- [13] 张岱年文集(一)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9. 257、277、260.
- [14] 冯友兰. 中国现代哲学史 [M]. 广东: 人民出版社 1999. 198.
- [15] 陈卫平. 从“认识史”到“智慧说” [A].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J]. 1989. 3.

注释:

1. 本文所引的该《审查报告》，出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的附录，第 434—438 页，以后不再注明。
2. 《陈黻宸集》上册，第 415 页，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3. 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第 2 页，中华书局 1916 年。
4. 《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第 1071、1072 页，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5. 《胡适文存三集》卷二，的 105 页，黄山书社 1996 年版。
6. 《三松堂全集》第 1 卷，第 213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7. 《中国哲学史大纲》，的 2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
8. 陆懋德：《周秦哲学史》，第 4 页，京华印书局 1923 年（线装一册）。
9. 钟泰：《中国哲学史·凡例》，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
10.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 4、22 页。
11. 《中国哲学史》下册，第 5—6 页。
12. 《中国哲学史》上册，第 3、6 页。

13. 《中国哲学史》上册，第 10 页。
14. 《三松堂全集》第 11 卷，第 402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5. 《中国哲学史》上册，第 12 页。
16. 《中国哲学史》上册，第 8 页。
17. 《三松堂全集》第 11 卷，第 270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8. 《中国哲学史纲要》上卷，第 5 页，中华书局 1934 年版。
19. 《中国哲学史》上册，第 10 页。
20. 《张岱年文集》第 1 卷，第 257 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21. 《张岱年文集》第 1 卷，第 277、260 页。
22. 《中国哲学大纲·自序》，第 17—18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23. 《张岱年文集》第 1 卷，第 268 页。
24. 《中国哲学大纲·自序》，第 17 页。
25. 《中国哲学大纲·自序》，第 18—19 页。
26. 以上引文均出自《中国哲学大纲·序论》第 1—5 页。
27. 《中国哲学大纲·自序》第 18 页。
28. 《中国哲学大纲·序论》第 5 页。
29. 《中国哲学大纲》第 587 页。
30. 我目前没有文献资料能证明金岳霖在 1940 年代看到过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书稿或讲义。
31. 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第 198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 年版。
32. 参见陈卫平：《从“认识史”到“智慧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 年第 3 期。

The Issue of Jin yuelin and the Discussion of Subject Independence of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Chen weipi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bstract: In his paper *the Report of Review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of Feng youlan, Jin yuelin asked , *i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or philosophic y history of Chinese?* The issue acutely revealed the contradiction of modernity and nationality of inner subject independenc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o the academe: as an independent subject, di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show the nationalit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or rebuild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according to western modern subject standards? The issue revealed

the contradiction, and we could find some feedback from the practice of Hushi .Feng youlan, and Zhang dainian. The paper would prove the idea through analyzing the research of independent subject of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of Hushi .Feng youlan, and Zhang dainian.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dependence of Subject; Modernity; Nationality

收稿日期: 2006-6-4

作者简介: 陈卫平,男,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